

第7卷第1期 2014年1月

Vol. 7, No. 1, January, 2014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高等教育事业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1
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	4
国际高等教育思考能力的减退.....	8
高等教育冲突中和冲突后的情况.....	11

亚洲的高等教育

伟大的美式大学可以在亚洲落地生根吗?.....	13
亚洲存在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吗?	15

国际化趋势

迅速发展的西班牙：一个延迟的梦?	17
欧洲国际化 25 年：变革世界中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19
欧盟内部的特许加盟院校和分校.....	22
印度：学生的流动趋势.....	24
与非洲的大学开展学术合作.....	27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

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大国.....	29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财政.....	31
哥伦比亚的认证：成就与挑战.....	33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埃及大学中的民主改革.....	35
越南：新法案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37

新书推荐	39
------------	----

高等教育事业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本文是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在与第一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圆桌会议的与会者们磋商后形成的。该会议于2013年11月2~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这份《上海宣言》(Shanghai Statement)旨在强调全球高等教育对“思考能力”、数据、政策分析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我们相信,院校和高等教育体系面临大量挑战和危机,需要深思熟虑的领导和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我们不能再依赖外行管理和临时对策来解决前所未有的问题。

背景

高等教育对全球知识经济、社会流动和劳动力发展都至关重要。世界各地都在为高等教育注入巨额投资: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新兴经济体略少。全球高等教育现有近2亿在校学生。由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对知识经济、社会流动、研究的开展和传播十分重要,因此已经在很多国家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私人部门和学术机构自身都需要数据和政策指南来适应不断变革的环境。

一些国家已经兴起高等教育研究,以服务于这些需求。政府和其它机构搜集相关数据。研究被用于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和实践提供指引。相关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主要位于大学,政府机构和私立组织也建立了相关机构。目前为止,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还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

高等教育需要专业的管理。尽管目前只

有少数几个国家提供这种培训,但也有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目前的学术机构大多是体量庞大、层级复杂的实体,需要专业的管理。已有一些针对大学服务和管理的培训项目,例如学术机构的顶层领导培训。

如果高等教育体系要得到有效的管理和领导,高等教育领域就要在全世界拓展,并需要细致的关注和发展,最终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所需的结果。精明的决策需要数据和分析。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专业队伍需要培训和教育。为了更好的理解院校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学术事业的特点,以及对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教学和社会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就需要开展研究。

必要的基础设施

高等教育需要一系列院校和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合格的研究人员、学者和教师队伍,来为不断扩大、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视野提供所需的研究、分析和培训。其中包括:

- 研究中心。培养和保持高等教育研究能力需要无私奉献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研究中心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此最好能设置在大学里。它们需要经验丰富、精通高等教育的员工。这些研究中心可以附属于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研究机会并给予学术环境的刺激。足够的规模、范围和专门预算都是必要的。
- 招生过程中,高校必须指派员工逐个回应考生的询问,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帮助。这不便宜,但如果能将目前放在中介处的预算转而投在这方面,那么这些经费将得到更好的利用。

• 培训项目。在大量招生和院校扩张的时代，高等教育管理需要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导力和学术生活的一些专门领域（如研究管理、质量保障、财务或学生发展）开展培训项目。其中有些项目可以是硕士或博士学位项目，这些项目常见于美国。尽管大学不能等同于其它类别的商业实体，但一些国家提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管理学学位项目，这些项目常见于英国。专注于大学管理和其它高等教育问题的短期课程项目也会是有用的。

• 院校研究和统计数据。各种学术机构和高等教育体制都需要具备很强的研究能力，掌握数据搜集方法。为了有效的做决策和规划，越来越多国家的大学搜集和分析有关其自身特征、政策和成果的数据——这项活动一般被称为院校研究。国立高等教育系统和政府也要求开展有效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好数据常常不可获得，这妨碍了院校研究和有效决策。

• 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比国际数据及其分析非常重要。这一点特别明确，因为学术机构和体制自身越来越全球化。目前，还没有什么国际组织有能力或者兴趣来系统的搜集和分析各种高等教育数据，例如关于院校、体制和趋势的基础数据统计。各地的情况也一样。此外，国际组织可以为政策问题等提供在一个宽广的比较框架下的“思考能力”。

• 政府必须提高对教育信息研究中心的支持，敦促各国提供当地的信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员工，这些员工可以为潜在的学生们提供工作坊和指导。

• 专业组织和研究中心。随着高等教育变得复杂和专业化，必然会带来对学生事务、国际化或学术管理领域的专门知识和分析的

需求。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组织可能会对大国、地区和国际都有用。

政策环境

高等教育面临大量挑战。目前存在许多迟迟未能解决的政策和实践问题，它们需要深度的研究和分析。政策和实践多种多样，需要各种研究和分析方法；同时，这些问题值得整个高等教育界的关注。

• 全球化的内涵——跨境活动，国际学生流动，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和相关主题。

• 高等教育质量和平等的挑战。

• 治理——在大众化和公共资源缩减的时代，最好的治理模式是什么？有效的实践是什么？

• 体制——学术系统要怎样组织才能满足大众化和全球知识经济的需求？

• 私立高等教育、私有化、商业化和相关问题；以及

• 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及其经费、政策和实践相关性的影响，以及向院校和政策制定者维持和沟通研究结果与分析的方式。

对未来的承诺

高等教育是日渐兴起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对世界各地的社会流动和劳动力发展都越来越重要，需要专业人才、知识基础、对关键问题的相关研究，以及培训学术机构和体制的专业负责人。与政府决策者、私人部门和学术界联系紧密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项目，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成功具有必要性。

然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项目的有效性取决于：

•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同行和伙伴进行强有力的对话；

- 培养前仆后继的青年研究人才，这些青年能够欣赏并致力于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而能够开展有思想深度、基于实证数据的决策制定；

- 培训学术领袖和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管理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

未来数年，作为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关键，有思想深度的领导力、以未来为导向的规划以及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持续投入，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需求。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认识到研究、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这一基本动力，并为其发展全部潜力做出实质的贡献。高等教育的未来扑朔迷离。

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圆桌会议上，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们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专家们汇聚上海，专程讨论这一宣言。这份文件大体上反映了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关键转折期，33位研究和政策专家们对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和培训领域未来发展的思考。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创新、高等教育和研究发展中心”（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组织了工作坊。这是瑞典国际发展署（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发起的一项活动，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也参与了合作，并得到了瑞典的国际发展署和南非的非营利组织桑托拉斯（SANTRUST）的资助。

注：2013年11月2~3日，第一届国际

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

Karen MacGregor

《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流程编辑, 本文也在该媒体上刊发。

电子邮箱: editors@iafrica.com

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教授认为,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发展分化而有效的学术体制, 以及帮助所在国跻身全球知识社会并与先发知识经济体同台竞技上,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阿特巴赫教授是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的研究教授和主任。

阿特巴赫教授在其文章《推动国家和全球知识经济: 研究型大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Advancing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The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文中这样写道: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尚未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 但它们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格外重要”, 并正在不断改善国际声誉和竞争力。“关键在于, 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关注点和使命的活跃院校群体。”

阿特巴赫的文章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期刊的一期特刊上。这期特刊旨在介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创新、高等教育和研究发展中心”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就高等教育知识结构进行合作调研的关键观点。

研究型大学被定义为“致力于在广泛学术领域进行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 具有足够的实验室、图书馆和其它基础设施, 从而能开展最高层次的教学和研究”。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在学术体制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 包括开展研究和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核心使命。

“研究型大学不是象牙塔, 而是与外部广阔的世界紧密相连; 其开展的多数研究是合作完成的, 受大学外部的资助和赞助。研究型大学是相当复杂多面的机构, 服务于许多社会角色。”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具有很多共同特征, 阿特巴赫指出, “受制于特殊的传统, 发挥着相似的功能,” 各国存在差异, 但“研究和教学的协同是 (研究型大学) 共同的特点。”

他认为, 知识生产和传播必须是国际化的, 在世界上更广泛的拓展研究能力势在必行。

“可以这样说, 所有国家都需要本国学术机构与全球的科学和学术体制相联, 这样才能够理解先进的科研发展, 并有选择的参与到全球科技中。”

许多国家可以负担至少一所优秀大学的建设, 这样的大学质量高, 足以参与科学和学术的国际讨论, 并在与国家发展的相关领域开展研究。

所有国家都想要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在世界各地，各国已经意识到，研究型大学对21世纪的知识经济十分关键。美国 and 英国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现有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标准。德国已经为重点院校特意注资，而日本已经建立了竞争性拨款来创造卓越研究中心。

阿特巴赫写道：“中国大陆已经重视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印度最终也开始思考其主流院校的质量。韩国、智利、中国台湾等地区也启动了相似的提高办学标准的计划。”

“非洲的几所实力一直很强的大学，正在外部资助者的帮助下寻求质量改进，试图取得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但是这一过程总的来说落后于其他各大洲的学术发展水平。”

“研究型大学已经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日程表上，特别是那些试图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的大国。”

研究型大学和学术体制

阿特巴赫指出，研究型大学在任何学术体制中都是一个小而精、但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有400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研究型大学约220所。英国有100所大学和300所高等院校，但只有25所研究型大学。“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所研究型大学，但是许多国家或地区连一所也没有。”中国有3000多所高等院校，一直在发展约100所研究型大学，这是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容之一。

阿特巴赫写道，研究型大学要繁荣，就需要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学术体制。加州的三层式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范例，这个

系统根据《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The Californi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的指导思想建立，拥有10个校区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位于顶端，23所州立大学系统招收了43.3万名学生，社区学院系统招收了300万学生。这三层院校在资助模式、使命和治理上泾渭分明，州政府的协调维持着它们不同的使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将效率的理念视为资源分配的核心原则，将追求卓越深深植根于其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之中，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是《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缔造者，他看到了研究型大学的关键特征：内部治理主要掌握在教授手中；关键决策由学者参与——以共治为核心；严格的精英治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学术自由；以及服务社会。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清晰的区分高等院校的办学使命，并理智的管理院校。

阿特巴赫指出，“恰当的拨款模式、踏实的教学安排、行政管理措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办学元素，都需要被组织起来并付诸实施。让快速扩张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与体制融为一体，这也是必要的。”

“事实是，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中国家早早预备好了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学术体制；这一重要的组织要求仍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关键任务。”如果没有一个能根据国家需求变化的恰当体制，研究型大学就不会得到充分发展。

“必须清晰地辨认并支持这些学校。应该采取措施，充分限制研究型大学的数量，

这样这些学校才能获得经费，高素质的学者等其他资源也才不会被分散得过开。”

阿特巴赫探索了有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沟通和网络，杂志，图书馆，学者的非正式群体，学术会议和专业组织，互联网，知识聚集地，作为重要研究中心的研究型大学，科学和学术的全球化，国际化和研究型大学，语言困境和学术职业等。

现状

阿特巴赫写道，“按照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话说，对研究型大学而言，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尽管研究型大学、国际学术网络和研究的重要性广为人知，但是许多国家都没有意识到打造和维持它们的复杂性和所需的资源。

他列出了成功研究型大学所具备的一些特征：

- 事实上，这些大学都置身于一个高度多元的体制中，站在学术等级制度的顶端，因其所负的使命而获得恰当的支持。
- 研究型大学（除了美国、日本的学校，以及拉丁美洲的少数与宗教有关的院校）绝大多数都是公立院校。尽管一些重视研究的私立院校正在崛起，例如土耳其、印度和拉丁美洲，但是私人部门很少能支持一所研究型大学。
- 在研究型大学与当地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不存在竞争或者两者间紧密合作的地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相当成功。俄罗斯、中国的“科学院”系统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研究所与大学缺乏联系。一些国家正在试图将研究所和顶尖大学更好的整合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合并它们——这将毫无疑问地壮大这些

大学。

- 研究型大学非常昂贵，所需的经费比其他的大学更多——如此才能吸引到最好的教师和学生，并为顶尖研究和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生均成本”超出整个系统的平均水平。教师工资丰厚，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精良，优秀学生和贫困生都有奖助学金，这些都是学校必要开支的一部分。
- 研究型大学必须拥有充分的、持续不断的财政预算；如果经费不足或者预算随着时间的波动幅度过大，学校就不能成功。
- 同时，研究型大学具有获得巨额收入的潜力。学生们常常愿意为学位的附加声誉、高质量的学术项目以及获得顶级教授的指导而支付更高的学费。研究型大学也会产生具备市场价值的知识产权、研究发现和知识创新。在一些国家，它们还能获得慈善捐赠。
- 研究型大学需要有与其使命相当的基础设施，例如耗资巨大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以及高端信息技术。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设施复杂而昂贵。它们不仅需要建造基础设施，还必须对这些设施进行维护和定期升级。
- 研究型大学需要自治权来管理并运行其项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平衡自治和问责可能比较复杂。
- 学术自由是所有高等院校的必要要求，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结论

阿特巴赫总结道，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位于学术等级制度的顶端，对于任何知识经济的成功都很重要。“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这些院校来参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因此，理解研究型大学的特征并打造成功的研

究型大学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才环境，这是头等大事。”

注：本文所有引述来自阿特巴赫教授的文章“推动国家和全球知识经济：研究型大

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Advancing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The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2013年4月出版于期刊《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思考能力的减退

Philip G. Altbach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半个世纪以来, 几个国际政府组织一直在提供全球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平台, 开展政策分析和支撑研究。这些组织发布了政策文本、专著、书籍和杂志, 资助国际会议, 并且不时资助和协调开展针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研究计划。他们也开展数据统计, 不定期发布有关全球和地区高等教育问题的政策文本。也许最重要的是, 他们组织研讨论坛, 将高等教育的领袖们、研究人员和关心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汇集在一起。能够开展全球性的合作并将多方力量汇聚起来, 这具有非凡的意义, 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和研究这样的复杂议题。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过去数年间, 参与了这些活动的两个顶尖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已经渐渐远离了高等教育, 留下相当大的一片空白。只有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这个后来者还在临时性的政策研究和一些研究活动中保持活跃。

这种活力的减退非常不幸, 因为高等教育对“思考能力”、当代问题分析以及对话和辩论的“主办权力”的需求远甚于以往。这非常令人惊讶, 因为高等教育对世界各国的重要性也远甚于以往。此外, 学术机构和体系也越来越受到全球趋势的影响, 这一趋势

需要对比分析、国际辩论; 同时, 开展世界上“最佳实践”的分析也将另他们受益匪浅。

过去和现在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被广为诟病, 但它曾经为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了很大帮助。它是该领域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覆盖力的组织, 能够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在一些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顶层官员建立了独特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地区性办公室具备对东欧和中欧地区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能力 (尤其是在冷战期间), 以及对拉丁美洲地区开展研究的能力。一些期刊对高等教育发展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例如《欧洲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UNESCO European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出版, 2010年中心关闭。令人特别震惊的是, 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被关闭后, 没有安排一个有意向、有声望的出版商来承接它的出版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个高等教育世界论坛 (分别召开于1998年和2009年) 和一些地区性的会议也发挥过作用, 这些会议上政府官员、大学领导人和研究人员汇聚一堂。在过去十年, 这一整个框架都被系统地瓦解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基本职责主要局

限于工业化国家，但表现活跃，且非常有用。它的“高等教育制度管理”（*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项目资助学术领导人每年召开针对相关议题的论坛，并且出版了一份很有声誉的国际期刊《高等教育政策》（*Higher Education Policy*）。这份期刊被突然停刊，但同样没有人来延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曾资助大量研究项目，例如对2030年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分析，由此诞生了一些有益的书籍和讨论。但这些似乎都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视线从高等教育上转移而逝去了。这种发展趋势的象征就是“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的现状：开展了可行性研究之后，这一当初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被束之高阁，实际上被终止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曾经不时资助了那些针对高等教育重要议题的重要报告，例如《危险和机遇》（*Peril and Promise*）等。这些有深度的报告引发全球关注，有时会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也影响了全球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全球高等教育计划质量参差不齐，经费也不足，但是他们将几乎所有国家聚集起来思考高等教育问题，同时也发表了重要的相关文件和报告。

知识基础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包括立法活动、标准设置、政策主张、政策建议以及启动和实施各种实践项目，而这些事务暗含对内行专家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其它组织合作开展的“标准化工作”对于搜集教育对比统计数据非常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搜集了大量教

育相关统计数据，其中部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数据。这些工作在全球覆盖上有优势，但在准确性上有劣势，这部分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力不足、各国政府提供资料的可靠性不高。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在对统计数据的关注没那么高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据似乎更准确和全面，但是只覆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少数几个其他国家。

影响

不幸的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隐退，没有其他组织来提供这些服务或者涉及全球各国的信息。世界银行依然局限于少数全球高等教育问题，但是并不资助会议或联络利益相关者。大量的地区性论坛以及目的单一的论坛召开了，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两年一次的“世界一流大学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英国理事会（*British Council*）的“走向全球化”论坛（*Going Global*）和卡塔尔基金会（*the Qatar Foundation*）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吸引了一些参与者，但似乎没有核心议题，即使有议题也相对缺乏重要性。

欧洲国际教育联合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组织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他们的年会。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组织只关注高等教育的特定方面，例如欧洲国际教育联合会关注国际化、学生流动，“国际排名观测专家组”（*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 Observatory*）则关注大学排名。

组织和资助者一般都追随高等教育的当下“热点”或流行议题。目前的关注点是“劳动力培训”和毕业生就业能力：少数组织和

基金会已经对这些具有国际视角的议题产生兴趣，但是他们自身不具有全球视野或兴趣来打造一个开展国际研讨的知识基础。可以预料，下一波特别论坛和短期研究项目可能集中于“大规模在线网络课程”和其它远程教育元素。尽管这些短期关注点受到关注是理所当然，但是持续不断的对全球高等教育开展广泛的国际观察，这种投资是无可取代的。

对策

解决缺乏“主办权力”和“思考能力”的问题并不像火箭上天那么复杂。如果一个在全球具有恰当资源且广为而知的国际组织

能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这似乎不可能。像美国波士顿学院 TIMSS 及 PIRLS 国际研究中心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这样协调周期性量化和科学评估、受到大量机构资助、能够保持活跃超过十年的机构来承担这些责任，还是可能的。也许，一些地区性和国家级的的高等教育组织可以联合起来。也许，类似于卡塔尔基金会或具有客观资源的组织可以资助一项高等教育计划，而不只限于不定期召开会议。目前急需开展高等教育的国际辩论、讨论和数据搜集。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七零八落的筹划。

哥伦比亚和肯尼亚：高等教育冲突中和冲突后的情况

Iván F. Pacheco、Ane Turner Johnson

Iván F. Pacheco: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

电子邮箱: ivan.pacheco@bc.edu

Ane Turner Johnson: 美国罗文大学 (Rowan University) 教育领导力专业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johnsona@rowan.edu

大学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扮演了什么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等国际组织不断强调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也强调了经济发展对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和平的重要性。然而, 高等教育与和平建设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大量探索。

哥伦比亚和肯尼亚的案例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共同特征, 也存在重要的区别。他们都是中等面积国家, 居民数量相似(哥伦比亚 4 700 万, 肯尼亚 4 200 万), 都经历过内部武装冲突。哥伦比亚现在被视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从 1819 年至今一直是一个相对稳定但民主并非完善的国家, 1953~1958 年间受独裁统治。肯尼亚介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 1963 年从英国独立, 经历过政治骚乱: 政变失败, 独裁政权, 1992~1997 年间选举动荡。2007~2008 年, 肯尼亚经历了另一场纷争四起的选举运动, 导致 1 500 人死亡, 至少 30 万肯尼亚人无家可归。暴力风险让肯尼亚在 163 个受到“不稳定和冲突”威胁的国家中排第 22 位。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始于 1964 年。这场冲突被视为一场低强度的冲突, 主要影响农村地区。不像其他武装冲突, 哥伦比亚教育

系统并没有因为对抗而崩溃。然而, 冲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尽管媒体对冲突在大学中引起的骚乱、渗透和影响有所报道, 但是许多高校和他们的社区为建设和平和庇护人民所作出的努力极少见诸头条。

哥伦比亚的高校为退伍士兵复原做出了贡献。一些公立大学 (例如 Distrital、Pedagógica 和 del Valle 等大学) 招收退伍游击队员为普通学生 (每所学校约 200 人)。今天, 许多公立大学和一些私立大学为退伍士兵、难民和常规武装力量中的荣誉退役军人和严重伤残军人设立分配了特别名额。对那些学历不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一些高校创建了非正式的教育项目, 为他们进行技能培训, 以帮助他们谋生。

在服务 and 拓展理念笼罩下, 许多哥伦比亚的大学发展出了项目帮助难民、退伍军人或他们生活的社区。大学的工作室普遍都提供法律咨询和代表服务、心理指导和其它服务。少数几所大学建立了项目帮助受害者恢复记忆或获得关注, 包括圣托马斯大学的一个名为“La Palabra Tiene la Palabra”的广播节目、一个表彰土地赔偿领导人的网站 (<http://www.estatierraesmia.co/>) 以及塞尔吉奥阿沃莱达大学 (the Universidad Sergio Arboleda) 的一个创业基金会。

肯尼亚

发生在2007~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暴力集中在内罗毕、大裂谷和西海岸地区。在最近的危机时期里，公共服务停止了，许多大学被迫关门。然而，选举暴力对肯尼亚高等教育的影响的确遭到媒体和学界的忽视。即使是著名的Waki Report（针对选举期间暴力行为的调查报告）也忽视了大学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报道。然而，肯尼亚的公立院校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教师都试图减轻危机对校园和周围社区造成的影响。

冲突的中心内罗毕地区有许多高等院校，其中有两所重点公立大学：肯亚他大学（Kenyatta University）和内罗毕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冲突期间和冲突发生后，在这些大学中，转移冲突的活动、进程和新的实践一直在进行。两所大学都通过“冲突解决工作坊”（conflict resolution workshops）来切断冲突路线，并为那些受到冲突影响的校园利益相关者提供慈善救助。在肯亚他大学，外联办公室是慈善救助的核心部门，负责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衣食。最后，两所学校的大学员工都反映，自己对于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有思想转变，特别是学校对师生一视同仁举办的心理辅导服务，建立起了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在内罗毕大学，管理人员描述了通过同仁之间的咨询以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由学生领袖和学生领导的组织参与），防止在校园里煽动暴力。此外，这些大学还尝试维稳，防止潜在问题演变成校园暴力，例如通过推迟收费避免在危机期间继续收取学费。

最近，肯雅塔大学在肯尼亚东北部的达达阿布难民营（the Dadaab refugee camp）开了一所分校。这个地方是索马里难民和国内难民的家。这为难民营里的很多人带去了希望。考虑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达达阿布分校引入了项目管理、公共管理、财务和教育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项目。不断有研究表明，对教育增加投入能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难民被遣送回国的时候，难民们将带着知识和技能去重建一个和平的社会。由于冲突的发生以及大学尝试减轻冲突造成的影响，肯尼亚的大学已经开始承认其机构在和平建设和后续发展中的作用。

结论

武装冲突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肯尼亚，冲突导致了一些大学的暂时关闭。然而，冲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对和平建设的贡献总体上都被忽视了。

两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转移冲突的努力开始于冲突进行之中；大学并没有等待冲突结束、签订和平协议后才开始进行和平建设。和平建设的努力也采取了多种形式：从大学向社区组织慈善活动，到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贡献；从冲突解决工作坊，到高等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待业缓冲；从为军人复原做贡献，到在难民营提供高等教育。

和平建设是高等教育的一项功能，不应仅止于对冲突的反应，必须成为不稳定国家的高等教育使命之一。为大学提供参与和平建设的机会、资助其消减冲突的轰动，这会成为对暴力的新的可持续的回应。

伟大的美式大学可以在亚洲落地生根吗？

Harry Lewis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教授, 哈佛学院院长

电子邮箱: lewis@seas.harvard.edu

美国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布斯商学院 (Booth Business School) 的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将离开新加坡在香港办学的新闻在香港受到欢迎, 这种激动就像引进一位明星运动员一样。教育部长吴克俭宣布说, 这一转移会“提升香港作为地区教育中心的地位, 培养人才支持经济增长, 并加强香港的竞争力”。

但是, 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的变革更像是生物进化, 而不是板球比赛。灭绝也是进化的一部分——几所美国在新加坡的其它分校, 包括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的提斯克艺术学院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以及内华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的酒店管理学院, 正在从狮城撤退, 前途未卜。

伟大的美式大学花了数百年才建成, 但亚洲正在试图走捷径。美国的大学似乎认为, 知识界的白令陆桥已经贯通。突然, 他们看到巨大的陆地上没有任何自然的竞争者, 这是一个令入侵物种充满希望的生态系统。

对一所大学来说, 放弃政治表达权力意味着放弃追求真理。我认为, 这句话在两方面都是虚的。我在想, 几十年后, 我们将怎样评价今天的高等教育创新呢? 也许一些新的机构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验, 是不适应环境的突变。例如, 新加坡政府不愿意继续补贴内华达大学; 新加坡和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联合办学也在政府的巨额补贴花光后面临关闭。

所有这些都是臆测和试验。这些美国移植来的大学中有任何一个能“存活”过十年吗? 如果这些移植来的大学有幸存活过了这个世纪, 那么他们和他们令人尊敬的美国堂兄弟之间会变成陌生人吗? 就好比, 撕咬的虾群不再将对方视为亲属, 因为巴拿马海峡将它们分成了加勒比种群和太平洋种群。

如果对于大学来说, 在新加坡办学太过于昂贵 (部分原因是新加坡货币相对强硬), 那么这些大学又会在香港怎样做呢? 那可能取决于香港对继续补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推动其运营的意愿。香港向芝加哥大学位于香港岛旧军营上的校区收取的十年租金只有1000港元, 我希望香港自己的大学 (这些大学自身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的产物) 受到同等对待。芝加哥大学当然感谢香港人民让该校有利可图的商学院项目变得更为赚钱。

风险在于, 香港和新加坡一样, 会发现这些对大学的补助不可持续。也许, 政府不应该过早庆祝胜利。正如一位新加坡官员所说: “如果一所名校不能说服学生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学费, 那么这就说明该校的品牌可能并非那么有吸引力。”

亚洲学术舶来物中的精华是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分校 (the Yal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ampus), 该校即将开学。分校所在的环境足够适宜支持其生存吗 (新加坡和美国的经费支持, 亚洲的学生)?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所学校的关闭与耶鲁大学教授

密切关心的问题有关：在一个由于批评政府（或探讨同性恋问题，或各种其他在美国的大学中不受约束的事情）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地方，教授要如何才能开放探究的精神下教学呢。

在某种程度上，美式大学冒险进入专制国家，将不得不按照当地的价值观规制自己的雄心壮志。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关于其上海分校的声明永远不会被冲蚀：“在分辨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政治表达的权利上，我没有任何困难。”

霍普金斯大学南京研究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的学生们曾经认为，他们能够出版一份刊载有学生抗议文章的杂志，就像他们可以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或者美国的任何地方所做的一样。但是文章受到审查，杂志迟迟未能问世。

约翰·塞克斯顿错了。任何事都能政治化，不只是人文科学，商业和法律的专业实践也一样。在一所学生有望研习任何社会问题的大学，放弃政治表达的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追求真理。

亚洲学界流动的大笔资金和对高等教育的渴求不能掩盖一个现实：美式高等教育是在一个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毫不妥协的环境中进化的。这种生态应该成为香港作为高等教育中心的最大优势。

不在市民中鼓励那种价值观的文化就不会成为美式高等教育长久生存的土壤——除非美式大学背叛了这些造就其伟大的价值观。

注：本文刊载于2013年8月5日的《*中华早报*》。

亚洲存在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吗？

Hugo Horta、丁智善

Hugo Horta: 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sbon) “创新、技术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电子邮箱: hugo.horta@ist.utl.pt

丁智善: 中国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电子邮箱: jisun@hku.hk

过去十年间,有关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快速增加,但是亚洲的高等教育研究还是一个发展不足的知识领域。尽管这个领域很小,但是可以说明亚洲研究发展的关键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通过分析38个国际期刊在1980~2012年间发表的亚洲作者文章(共514篇文章)探讨亚洲的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包括它的演化、知识中心以及合作。

我们发现,亚洲的高等教育研究体量一直在增加:2007~2011年间高等教育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亚洲研究的论文数是1997~2001年间的三倍。然而,相对而言,虽然亚洲的研究强度继续慢慢变化,但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亚洲占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5-7%)。这表明亚洲的高等教育研究处在相对潜伏期,紧跟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增长趋势。

集中并受限

对亚洲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分析表明,各国之间呈现出一些区别。在1980~2012年间发表论文在10篇以上的11个亚洲国家或地区是中国香港、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印度、韩国、伊朗、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他们的发文总数占亚

洲全部国际高等教育论文的90%。然而,这些国家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区别。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比日本的研究人员多发表一倍,在所有国家地区中排第二,比排第八的韩国多五倍。另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没有任何发表记录,主要分布在中亚。东亚的发表最活跃,贡献了全亚洲论文数的50%。这清楚展现了亚洲高等教育发展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巨大的不均衡现象。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亚洲国家合作程度低,高等教育研究的地区整合程度低。亚洲高等教育学者的国际化非常倾向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集中亚洲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互相合作上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其它国家,成为亚洲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研究中心。亚洲学者更多的通过美国大学互相交流,而不是通过亚洲大学或者直接交流。目前,亚洲的学者实际上还没有和南美或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因为人们猜测由于移民的关系,亚洲学者至少会和南美国家开展研究合作。

微乎其微的学者和大学

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注意到,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发表往往集中在少数亚洲的大

学,而且很多大学只贡献了一两篇论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亚洲发过论文的大学中,66%的大学只发表了一篇论文,15%的大学发表了两篇论文。这表明,多数亚洲大学极少参与高等教育相关研究。事实上,1980年至今只有9所(3%)亚洲大学在高等教育期刊上发表了10篇以上的论文。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学者的论文发表情况在这些亚洲大学中非常突出。9所大学中的4所大学有30~60%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是由一位学者发表的。这些学者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学者在大学之间的迁移导致了前后两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的剧烈波动。

结论

亚洲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的发展目前还

处在萌芽期,主要集中在东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分散的状态,地区之间不连贯,并且依赖于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联系合作,特别是与英语国家。研究表明,亚洲的高等教育学者规模还相当小,需要鼓励大学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这些激励不能仅仅通过公共政策来驱动,而应该由亚洲的那些积极学习怎样更好管理自身以及为亚洲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大学来驱动。

注:本文以《高等教育季刊》(*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最近发表的“亚洲高等教育:论文发表和合作发表分析”(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Asia: A Publication and Co Publication Analysis)为基础而写。请参见:<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hequ.12015/abstract>。

迅速发展的西班牙：一个延迟的梦？

Laura e. Rumbley、Laura Howard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副主任

电子邮箱: rumbley@bc.edu

Laura Howard: 西班牙加迪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ádiz) 讲师、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副主席

电子邮箱: laura.howard@uca.es

和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西班牙的经济和文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迅猛发展。西班牙的大学高唱着现代化的诗篇，满怀激情的推行国际化。但是，今天的西班牙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许多西班牙人生活艰难，国家深感不确定和悲观主义。这一令人不安的转折提出了两个问题：西班牙高等教育国际化目前的现状如何？在经费短缺和而又残酷的国际化的背景下，维持全球参与和优质大学的前景如何？

最好的计划

二十年来，西班牙一直致力于用各种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从 1987 年开始，西班牙就一直是欧盟“伊拉斯谟”计划 (ERASMUS) 的主要目的国和积极的输出国。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由外交部协调的规划制定鼓励西班牙的大学积极发展合作，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和北非地区的合作。

近年来，通过国际参与提升国家高等教育形象、质量和相关性的新计划依次启动。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步骤是 2008 年建立的名为“Universidad.es”的基金会，这是一个公共基金会，旨在促进西班牙成为国际学生和学者的目的国。

同时，西班牙政府在 2008 年公开了“大学策略 2015”计划 (Estrategia Universidad

2015)。这是一个旨在“大幅改进”大学体制和“提升至国际卓越水准”的蓝图。“大学策略 2015”计划在科技重点领域追求卓越，目的是提高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知名度，并将国际化放置在西班牙大学政策的核心。“大学策略 2015”计划的“国际卓越校园”计划 (Campus de Excelencia Internacional) 强调聚焦研究和创新，鼓励西班牙各地的大学在重点领域 (从纳米科技到艺术) 发展专长，如此一来国家可以向最有前途的大学进行更战略性的投入，从而在特定领域内赢得国际认可。

延迟

可惜的是，西班牙开展新计划的努力令人失望了。2011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一个 (代表世界银行和国际大学学会的) 国际专家团队断定，西班牙朝着“大学策略 2015”计划目标的进展参差不齐，报告提出了 25 个针对改进绩效和克服困难的特别建议。国家终止了“国际卓越校园”计划的拨款，这让很多校园计划无法实现，其它校园只能依赖于有限的地区拨款。2013 年 6 月，作为减少公共支出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宣布“Universidad.es”基金会可以被整合进西班牙的欧洲项目总局 (Organismo Autónomo de Programas Educativos Europeos)。官方对于怎

样完成（法律和实践上的）整合并不清楚，这对于“Universidad.es”基金会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个好兆头，原本它应该是一个清晰的、灵活的、有效的向世界宣传西班牙高等教育的计划。

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西班牙不再能维持其富有雄心的大学国际化进程了。2008年，国家遭遇大衰退。2012年末，全国25岁以下公民的失业率超过55%，在那些偏远地区还要更高。西班牙的年轻人比以前任何一代的受教育程度都高；然而，这些大学毕业生（包括越来越多的硕士毕业生）并不能找到一份足以支撑独立生活的工作。事实上，很多传言表明，这些找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在应聘入门级职位时不至于资历过高，故意让简历上的受教育程度看上去比他们实际的低。许多人利用在欧盟内部自由迁徙的优势在其它地区寻找工作（特别是德国）。2008年以来，青年移民已经增加了41%，这引发了对国内人才流失和国家未来投入丧失的讨论。

对于大学生而言，支付学费变得更加困难。公立大学的学费虽然在不断上涨，但总的来说并不令人觉得过分；然而，那些不得不重修课程的学生却无法面对学费的急剧上涨。由于收入缩减、助学金门槛拉高，家长和学生都承受着很大压力。在情形加以恶化的情况下，西班牙的大学都在考虑求助于私人捐赠者，帮助学生度过经济困难。最近的数据表明，约3万名学生可能会因为没有额外支持而辍学。

大学教职工也受到影响。随着大学公共支出从2010年起压缩超过12%，大学教师的工资不仅停止增长，很多大学还下降了约20%。晋升机会渺茫，许多编外职工没有能够续签合同。职工流失导致现有职工的超负荷工作。士气低迷。最近一位移居美国为航天局工作的西班牙科学家发布了一封言辞遗

憾的公开信，“我将开展的科学研究不再属于西班牙，也不再归功于西班牙；我要把西班牙抛之脑后，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这封针对西班牙科学迁移的公开信（西班牙科学学会和西班牙大学校长联盟达成协议）目的是敦促政府将研究支出提高到2009年的水平，从而“避免目前西班牙研究系统的衰落造成长期损害”。

保持前进

尽管国内情况很糟糕——或者更准确的说，由于这种糟糕的状况——国际化被广泛认为是西班牙大学复兴的唯一有效路径。大学被视为将西班牙建成“智慧、可持续、包容的欧洲经济体”的基础。人们也清醒认识到：21世纪的西班牙大学必须成为全球参与的院校。

在目前困难重重的环境中，选择很有限；但是仍然存在机会。西班牙最重要的机会之一是其对国际学生持续的吸引力。2011/2012学年的数字表明，西班牙比其他相关国家接收的“伊拉斯谟”学生都要多（共3.93万名，占全学年总数的19%）。前10所接收“伊拉斯谟”学生最多的大学中，有6所位于西班牙。在欧洲之外，西班牙是美国留学生的三大目的国之一，2010/2011学年接收了25965名美国学生（比四年前增加51%）。

尽管国际化的含义远不止学生流动，但目前西班牙可能必须聚焦于这一“唾手可得”的果实从而维持国际化的发展势头。西班牙的大学还应该推进有效但低成本的战略，例如课程的国际化和其它“在国内开展国际化”的活动。然而，随着危机的解除，国家必须快速的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推行国际化愿景，提高院校质量，服务国家利益，打造以全球参与为学术卓越指导原则的大学文化。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未来的国际化必须更有效的“抵抗危机”。

欧洲国际化 25 年：变革世界中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Hans de Wit、Fiona Hunter

Hans de Wit: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the Università Cattolica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th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高等教育国际化专业教授、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创始人及前主席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Fiona Hunter: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中心顾问、助理研究员、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前主席

电子邮箱: fionajanehunter@gmail.com

随着 1987 年欧盟旗舰计划“伊拉斯谟”计划 (ERASMUS) 和 1989 年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建立, 欧洲发生了巨大变革。促进学生流动被视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历史纽带、政治和经济政策, 以及精英们的传统迁移 (从前殖民地到欧洲, 以及从欧洲到北美), 这些因素主导着国际教育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教育贸易、跨境办学以及海外分校当时还处在高等教育讨论和政策的边缘地带。那时候还没有大学的国际排名, 博洛尼亚还只是一座普通城市和意大利最古老大学的名字。商业化以及内涵模糊的“盎格鲁撒克逊现象”推动着合作, 后者与竞争有关, 否则不会延伸到整个欧洲大陆。

早前, 有关国际化的院校政策、国家政策和欧洲政策都不存在; 但是, 25 年之后, 欧洲委员会刚刚发布了第一份国际化综合战略《世界之林中的欧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同时,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庆祝了自己的 25 岁生日, 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会议规模空前, 吸引了全世

界 4800 名参会者。

欧洲高等教育：需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回应了欧洲高等教育目前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 早年的“伊拉斯谟”计划, 和欧洲委员会随后在欧洲内外展开的其它教育、研究和发展合作项目; 1992 年“马城条约”(the 1992 Maastricht Treaty) 将教育包括进去; 以及随后国家政府和高等院校对国际化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尽管焦点一直放在学生流动上,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却一直在考虑另外 90% 不流动的学生, 并在 1999 年启动了“在国内国际化”运动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这项运动和流动性、合作一起, 越来越被视为国际化战略的核心以及今天欧洲委员会国际化新战略的重要支柱。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从星星之火成长为燎原之势。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整合以及欧洲高等教育带着激动、创新、合作和扩张加速发展的时期,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变成了工作联盟。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和欧洲委员会的政策都受到欧洲统一、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作

为课程核心活动的教育国际化这些远大愿景和理念的驱动，这不仅是为了个人发展，也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对欧洲未来的乐观和信仰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1999年发布的“博洛尼亚宣言”（the Bologna Declaration）。

面向其它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

由于“伊拉斯谟”计划积累的合作经验和影响力，博洛尼亚进程的构思和发展都很顺利，这也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欧洲计划之一。一开始，为了促进学位结构、学分系统和质量保障的共性，以及为欧洲议会设置内部秩序是焦点；但是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外部秩序。新兴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不仅为欧洲高校创造了一个外部身份，还让人们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新工具和模式产生了强大的兴趣，尽管这些工具和模式可能还没有在欧洲充分施展开来。

在这个时期，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7个，欧元被引入成为统一货币。然而，整合的观念以及统一欧洲全境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安全很快遇到威胁，首先是2001年“911袭击”，然后是2005年荷兰和法国选民拒绝《欧盟宪法》（*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和欧洲经济问题。

同时，欧洲高等教育正面临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崛起、经济平衡和人口转折以及信息技术加速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压力。2000年，欧洲历史会制定的《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努力让欧盟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和最活跃的知识经济体，不过这种努力可能过于野心勃勃。随着大学开始反思，基于社会和工业界对大学角色的感知而制定的全球排名开始发挥影响力，要求大学做出空前快速的变革。

高等教育贸易的兴起

因为新的国际教育行业即所谓的“高等教育贸易”正在崛起，欧洲国际教育协会论坛发展很快。它成为了欧洲的核心竞争优势。战略伙伴、联合项目、双学位以及其他合作项目在论坛上都很受重视。随着欧洲国际教育协会论坛不断取得成功，欧洲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控制下经历更大的不确定性。“欧洲梦”对于25年前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的诞生影响极深，这个梦正在受到巨大挑战。创建欧洲公民身份是欧洲计划的一个关键目标，但却似乎越来越难。

在高等教育界，新的教育提供者不断涌现，挑战着传统的大学模式。非营利和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3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院校。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也出现了，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程被评论为新的游戏规则变革者。

新的机遇

人们希望大学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国际化被视为是对全球化的关键回应。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大学国际化的认知，大学国际化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不再专门局限于国际化办公室，而是成为大学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要求大学开展重大反思，每所大学都必须结合自身使命和情况来诠释国际化。日益增加对学生与员工的跨文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能力与学习成果的重视，以及对国际化、就业率和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重视，这些都需要新的路径、战略和方法才能有所成就和影响。国际化仍然是全能的“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吗？或者，国际化所谓的阴暗面会造成紧张气氛从而让国际教育有利可图的理由有所逊色吗？我们会在下一个十年看到一个大概完整的“欧洲”吗？还有，这将怎样影

响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呢？

日后不可避免地还会有更多挑战，有关高等教育角色和责任的基本问题会浮出水面，随之而来的还有国际化目的和范围的基本问题等等。未来25年，欧洲委员会的新政策以及欧洲国际教育协会作为欧洲和国际高等教育知识中心的继续努力，将会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创建一个新平台，这些问题也有望得到回答。

注：本文由作者摘选并更新自《可能的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下一个25年》（*Possible Futures, The Next 25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该书于欧洲国际教育协会成立25周年之际出版（www.eaie.org）。

欧盟内部的特许加盟院校和分校

Lukas Bischof

德国 CHE Consult 高等教育咨询和研究公司项目经理

电子邮箱: lu-kas.bischof@che-consult.de

“博洛尼亚进程” (the Bologna process) 旨在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 在欧洲打造更加可比的、兼容的、连贯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确, 该区域内学生、教师和研究团队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此外, 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跨境提供学习项目。这种跨境高等教育 (cross-border pro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最常见的模式是联合学位或双学位。虽然分校、特许加盟院校比较少见, 但不久前在欧洲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争议。

欧洲立法创造了一个共同市场

欧洲共同市场保证了欧洲人的学历证书能被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认可, 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同时, 也允许在其它欧盟成员国开展服务贸易。持有西班牙学校毕业证的人可以在德国或其他欧盟国家从事自己的专业, 波兰的公司可以在爱尔兰提供服务。没有成员国可以侵犯这些权利。

另一方面, 教育一直是每个欧盟成员国的自留地。然而, 2008年, 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中, 欧盟法院宣布, 特许加盟院校的学习项目是毕业证授予机构所在成员国的责任, 而与授课地点无关。现在, 这一裁定让一所英国大学可以在另一个欧盟国家 (例如希腊) 开办一所未接受认证的机构 (或公司), 有权授予英国学位, 不用管接收国自有的教育责任。因此, 接收国必须像接受其它欧洲学位一样接受这些学位。教育出

口国的唯一责任是这些学位的质量保障, 尽管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 学位授予机构怎样对特许加盟院校的学位进行质量保障并不清楚。

跨境高等教育的欧洲版图

尽管存在消费者保护、透明度和欧洲高等教育信用, 但直到最近才透出一丝丝跨境提供高等教育的范围和质量保障的信息。现在, CHE Consult 公司代表欧洲委员会 (欧盟的行政机构) 发布了第一份针对欧盟内部分校和特许加盟院校的系统研究和综述, 这也是一份针对欧盟各国立法管理它们的综述。通过搜集和验证来自 27 个国家的部委、质量保障机构、校长论坛、跨境高等教育提供者和认证组织的数据, 我们找到欧盟目前的 253 个分校和特许加盟院校案例。完整报告参见: http://ec.europa.eu/education/highereducation/doc/studies/borders_en.pdf。

研究结果证实了此前针对跨境高等教育的研究结论。首先,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第二, 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是学位的“出口国”, 而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倾向于成为“接收国”。研究指出, 英国、美国、法国和波兰是欧盟跨境高等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而希腊、西班牙和匈牙利则是主要的接收国。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可以认为, 一个国家的教育服务接收数量与学生出国留学的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

学上的相关。

立法常常不连贯

由于高等教育立法是欧盟成员国的自留地，因此欧盟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些成员国并没有针对跨境高等教育的政策。在那些设有该政策的国家，有的要求强制注册，作为一项管理手段；有的彻底禁止任何教育提供形式。一些成员国要求通过出口国的认证，其它国家要求院校得到国家的官方授权。在一些情况下，成员国要求外国的教育提供者接受额外的认证手续，这有效地强制其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但这似乎明显违反了欧盟法院的裁定。除了彻底禁止跨境高等教育活动以外，成员国有时还通过拒绝国外学位持有者进入该国高等教育体制来阻碍外国跨境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运作；不允许学位持有者进入国家规定的行业或成为政府雇员（这可能与欧盟法律冲突）；同时，还禁止外国教育提供者寻求国内认证。该研究详细描述了各成员国针对教育提供者流动性的立法。

质量保障的漏洞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了目前欧洲跨境高等教育立法的不一致和潜在的漏洞：在欧洲层面，欧盟严格执行共同市场，保障不同成员国之间的文凭认证。同时，质量保障的责任由各成员国承担。由于注册要求的高度分化，并且缺乏教育提供者和项目的联合“白名单”，劣质的教育提供者占了体制便宜的事情众所周知。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的特许加盟院校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结构和偶然因素如何在跨境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作用。威尔士大学很不寻常，它是一所能够授予学位的联盟院校，但并不直接运营任何一所加盟院校。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里，它发现自己的联盟院校在流失，因此变成特许加盟院校模式以巩固地位、获得收入。2009/2010学年，其国际特许加盟院校达到140个，遍布30个国家，营收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

直到2011年末，英国质量保障机构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质疑其特许加盟过程的质量，该校才宣布只在国际范围内提供由其自行设计和监控的项目。这所大学能够这样运作的事实折射出英国高等教育体制高度的自治、国际活动的受欢迎程度、获得收入的需要，这也反映出主要的质量保障机构缺乏正式权力来改正或剥夺劣质院校资格。然而，在欧盟内部，其它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权力拒绝认可威尔士大学的学位。

促进质量保障和透明度

我们对特许加盟院校和分校的现状和管理所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一个学位认证和建校自由都得到保障的、聚合的欧洲高等教育区需要相应的透明度和质量保障机制。这个质量保障框架应该包括一个共同的欧洲高等教育项目认证和质量保障登记制度。共同协商通过的标准和一份相应的院校“白名单”将会有助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跨境教育保障透明和发展信任。

印度：学生的流动趋势

Wesley Teter、Don Martin

Wesley Teter：高等教育资深顾问

电子邮箱：Wesley.Teter@gmail.com

Don Martin：招生管理专家

电子邮箱：dmartin@gradschoolroadmap.com

印度赴美留学人数经过数年的下降之后，现在却显示出戏剧性转折的迹象。2013年4月，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宣布，申请研究生项目的印度学生数增长了20%，而全世界的总增幅仅1%。同样，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报告，2012年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th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RE)的印度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30%，表现出学生对出国读研究生的强烈兴趣。最重要的是，位于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也确认，2012年10月到2013年初的学生签证通过数也比同期增加了50%，这一数字令人惊讶。在过去四年印度赴美留学人数都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这些显示出增长复苏的指标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了。

流动趋势

印度赴美留学人数从2009年到2012年不断下降，总共下降了17%，本科生下降了16%。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下降趋势很少见诸于报道。例如，这期间印度在美留学的学生总数保持稳定(仅下降了3%)。同时，印度参与毕业实习(postgraduation internships, 一种可选的实践培训)的学生数在这期间暴涨了80%，全世界平均仅增长了28%。参与培训的人(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专业，这种培训期限可长达29个月)抵消了其它项目上的跌幅，让印度赴美学生流动性的现实呈现出一幅扭曲的图景。

从留学专业来看，经广受欢迎的搜索网站GradSchools.com确认，工程、管理和建筑管理是印度访问者搜索最多的前三个专业。下述相关问题有望驱动未来的流动性。因此，它们应该成为发展长期招生远景的基础。

职业和工作前景

印度12亿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惊人的54%。印度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和崛起的中产阶级作用在一起，有望驱动教育和培训需求，并在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印度在2012/2013财年(以3月为界)的经济仅有5%的微弱增长，为十年之中最低。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在日趋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上，一个美国学位是找到更好工作的竞争优势。

职业前景和投资回报是在印度招生时着重强调的两个重要因素。可选的实践培训、实习和职业服务常常促使家庭做出了这一生一次的投资。例如，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调查，博士学生尤其受到在美就业的吸引。来自中国、前苏联国家和印度的毕业生的回国率与其它

国家相比都非常低，分别是 3.7%、4.1% 和 5.2%。事实上，印度籍人士是世界上申请 H-1B（专门赴美工作签证）的头号国家，占全球总数的 59%。不幸的是，几乎没什么美国院校在拿着美国学位回印度的职业前景问题上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观点。令人意外的是，那些回国发展的年轻毕业生几乎没有有什么成功故事可举。

在印度的招生工作应该帮助学生理解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目标以及在美国的某所学校学习可以帮助学生达到这些要求。像三谷大学（Tri-Valley University）这种在 2011 年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调查出签证欺诈的院校，就不应该被允许主导有关教育和就业前景的论述。美国的院校可以通过确保申请人能够向领事官员解释他们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这所学校来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挑战。但那些无法这么做，或者单单专注于在美就业的申请人，则无法获得一份学生签证。这些潜在的学生将必须重新申请签证，或者考虑别的选择。

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印度，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有限，越来越多的学生转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周边的低成本国家。部分挑战在于，印度本土的高质量院校竞争激烈，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例如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由于质量保障体制不完善，次一等的印度院校标准参差不齐。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院虽然学费成本高，但物有所值。

在考虑留学目的地的時候，印度学生和家長评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排名和对学术质量的理解。在招生时，美国的院校非常

强调学业上的严格要求，而不是新的体育设施、餐厅、精致的宿舍等“花架子”，这些东西只能增加教育成本，与学术体验的质量或者未来的就业前景没太大关系。

新的财政战略

高通胀和美国学费的成本上升是出国留学的两个主要障碍，尤其是对本科留学。Renuka Raja Rao 是 EducationUSA 在印度的总协调员，他说“美国是出国留学的头号目的地，印度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去美国学习，而是怎样去”。赴美的学生流动下降与印度卢比的不断贬值（从 2009 年 1 月到 2013 年 7 月下降了 22%）有关。即使拥有部分奖学金，货币价值的急剧变动对于中产阶级家庭负担海外留学费用的能力仍然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的院校不应该将在印度的招生机会误认为克服预算不足的手段。需要新的财政战略来克服不断增加的留学成本，例如创造性的学术合作和混合的远程教学。

短期之内，参加印度的学生招生展并积极在社交媒体上曝光都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渠道。商业服务的提供者和招生中介都反映，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数在增加，但是目前无法获得有关签证通过和其它质量控制措施的数据。美国的领事官员提醒学生，中介人员有时可能“向学生出售伪造的财务材料”，这会让申请人最终在对谈过程中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而不够资格获得签证。

根据美国文凭认证组织世界教育服务（World Education Services）对印度留学生三大信息需求的调查，46%选择了“学费和生活成本”，38%选择了“经济援助机会”。相反，越来越多的美国招生官员所问的问题则是怎样不用去印度就能招到自筹费用的本科生，这个问题表现出美国遭受的财政压力，

但是却不能让印度家庭相信这些美国院校是因为学术兴趣而招收有才能的学生。那些具备良好招生策略（例如对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专业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的院校将在有效招收下一代领军人物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与非洲的大学开展学术合作

Ad Boeren

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 Nuffic 高级政策官员

电子邮箱: aboeren@nuffic.nl

多年以来,北半球的学术机构和非洲院校之间的合作都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从单纯的能力建设发展成平等的伙伴关系,从社会承诺发展成共同利益,从特定需求发展成全球战略。在全球变革和高等教育挑战的背景下,对这一过程的简要回顾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

早期发展

二战结束后不久,多数非洲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北半球通过培训技能型人才的方式对非洲进行了补偿。非洲学生获得了去北半球学习的奖学金,这些学生被寄予期望——毕业回国后为祖国发展做贡献。非洲新建的大学在外界的帮助下建起相关设施,发展了课程,对教职员工进行了培训。

在早期的那些年,北半球的大学形成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理念,这一理念也成为他们院校使命的一部分。即使不是用自己的资源施以援手,这些院校也会利用来自政府的发展合作经费来资助合作。北半球国家的很多政府都建立了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奖学金和合作项目,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变革

从早期发展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就一直在发生变革。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大大提高,无论是在北半球还是在非洲,但是经费

却没有同比例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受到了预算缩减的影响,因为当时发生了经济危机而且美元援助也减少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捐赠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领导下投身基础教育并将其作为人力发展的重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投资初级教育所获得的经济回报被认为比高等教育更高。2000年,全民普及初等教育被宣布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之一。世界银行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的兴趣不断恢复,但相对之前规模更为适度。

在这一时期,北半球还发生了其它变革,影响了与非洲大学之间的合作。在很多北半球国家中,政府决定改变高等教育的拨款规则,从输入型财政变成输出型财政。高校因此而被鼓励从市场运作和公私合作中获得额外的经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成为欧洲和其它地区许多院校关注的新焦点。院校、课程、学生和教职员工需要变得国际化,从而改进教育质量、刺激国际流动。1999年,欧洲启动了“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旨在建立一个贯穿大陆的高等教育区。

这些教育政策和拨款发生的变革迫使北半球的学术机构重新考虑他们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先事项和战略。他们不得不在维护专业领域和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中变得更加精

挑细选。与和贫穷国家声誉很低的院校开展合作相比，和那些富有国家（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享有声望的学术机构和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被视为更有益的行动。

与此同时，发展捐赠人限制了他们所捐助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目标。发展合作的钱应该被全部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再被用于“北半球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融资”。

捐赠政策上的这一转变削弱了北半球院校使用合作项目经费来追求自身学术兴趣的机会。作为经费压力、国际化优先方向和捐赠者出现变化的后果之一，院校与非洲院校开展合作的动机也变弱了。这从两个方向上看都是不幸的：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和支持，非洲大量的大学已经成为更好、更强的院校。首先，他们可能在全球排名上并不高，但可能成为全球新兴知识网络的战略合作伙伴。第二，大量非洲国家正在呈现的经济增长数字非常可观，他们将成为明天的经济伙伴，就像曾经发生在金砖国家身上的那样。从经济和学术的角度来看，与非洲院校开展学术合作也理应获得适当的关注。

新方向

然而，北半球院校（特别是那些北欧院校）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参与到与非洲院校的合作中去。

· 北半球的院校应该扩大他们的战略领域，从短期的、以赢利为导向的、利己主义的视角变成长期的、全球化的视角。他们需要清楚一个事实：世界正在快速变革，机会

也在变化。困难和研究问题都越来越全球性，需要通过与当地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办法。

· 非洲院校应该展示更多的自信心，说服那些真正的合作伙伴。尽管他们在合作的一开始不能做出同样级别的贡献，但是他们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到适当时候，双方的贡献会相当，一方可能还会超过另一方。

· 共同利益是建立可持续合作的最好的基础。共同利益可以建立在良好的分析和协商、适当的规划、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之上。来自这些合作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和长期的；同时，对于建立长期合作而言，发展合作经费不一定充裕。院校应该准备好对合作伙伴进行投资，原因不仅在于风险收益低，还在于若与较低排名的伙伴合作，其风险更高。

· 北半球的政府应该尝试在多个政策领域保持更大的一致性，特别是教育、发展合作、经济和外交事务上。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合作触及所有这些领域，如果这些政策一致且相互补充，将会大大帮助学术机构。除了德国等少数著名的特例，北半球国家的政府政策既不一致，也无益于参与国际合作和长期学术合作。

· 受资助的发展合作项目应该适当允许院校识别出那些不仅有益于政府部门政策目标而且有益于院校自身使命和战略的伙伴，并与他们开展合作。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要达成平衡。

对于北半球的学术机构来说，与非洲的院校开展合作应该具有战略利益，但这就要求院校领导者具有清晰的愿景，还需要一个一致的政策框架来刺激和支持这些努力。

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大国

Dante J. Salto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行政管理和政策研究系博士生,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PHE) 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dantesalto@gmail.com

高等教育的营利行为所招致的争议和辩论涉及市场活动的恰当边界。《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3年第71期) 讨论了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角色和政策影响, 指出了商业性机构(即营利性机构和常常隐藏在非营利性机构中的营利性活动)和日益扩张的合法营利性机构之间存在的一个关键区别。尽管许多非营利性机构参与营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 但本文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股东分红合法的机构, 且专注于世界最大的营利性高等教育体制。巴西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在2010年招收了超过200万名学生, 占私立院校在校生的43%, 占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的32%。历史悠久的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凭借其自身在21世纪初的大幅增长, 才大概维持了其头号招生大国的地位, 招收了超过300万学生。然而, 营利性高等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例远比在巴西系统中的小, 前者是11%, 后者是32%。

应该正确看待巴西私立高等教育特别是营利性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巴西2010年的在校生超过650万, 是拉丁美洲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 巴西适龄年轻人(18-24岁)的入学率却低于多数拉丁美洲大国, 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排第11位。巴西正在努力改进招生状况。今天, 巴西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73%)仅仅落后于智利

(79%)。20多年来, 巴西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的依赖要比拉丁美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营利性高等教育在巴西获得全部法律批文的第二年, 也就是2000年, 招生数就占到私立高等教育的18%、整个高等教育的12%。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高等教育相比, 营利性高等教育在2000~2010年间规模增加了537%, 十分惊人, 替换了公立高等教育在招生数比例中第二的位置。同一时期私立非营利高等教育和公立高等教育只分别增加了88%和85%。参与这轮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是那些收入飞涨的国内、国际大型公司。

公共政策

即使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华丽扩张并不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其最初却来源于一项正式的公共政策决策。首先, 1997年签署了一项总统令, 随后的1999年颁布了一项针对1996年教育法的国会修正案。在认识到许多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性机构实际上在营利但国家不向它们收税之后, 巴西逐步让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走向合法。换句话说, 大规模的私立高等教育扩张已经导致非营利性机构中的大部分都在营利。

一些观察人士声称, 卡多所(Fernando Cardoso)在其担任总统的20世纪90年代发

动的法规改革与其当政期间在不同经济部门中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所以，随着反对党平民党（populist party）在2003年当选，许多观察人士怀疑私立高等教育（主要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推进能否持续。然而，新总统达希尔瓦（L. I. 'Lula' da Silva）实际上给了支持私立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更多活力。他的“全民大学计划”（University for All Program）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入学率，特别是通过免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包括营利性的私立高等教育）。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长期落后，入学机会不平等，新政府将法律和计划的必要性正当化了。

学习领域的规模和状况

与全球的私立高等教育主要发展趋势一致，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在社会科学、商学和法学的招生比例最大（51%），教育学为17%，卫生和社会福利为15%。相反，公立高等教育更加集中于教育学（41%），其次是社会科学等（15%），以及工学、制造和建筑（12%）。

营利性机构倾向提供低成本的专业和投资高回报率的专业。招生遵循了同样的模式，营利性专业集中于社会科学等（43%）、教育学（16%）和卫生社会福利（13%）。与招生不同，专业设置方面的数据让我们走得更远。在第一梯队，多数专业围绕管理和行政管理（22%）、法学（5%）、会计和税收（5%）、市场营销和广告（4%）。在教育学专业，教学法占6%，其次是教师的专业领域教育（3%）。最后，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多数专业是治疗与康复（4%）、护理与初级保健（4%）。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在学习领域和专业的比例上表现出相似的组成，与营利性高等教育次

序一样。公立高等教育则区别很大，多数专业集中在教育学（41%），其次是社会科学、商学和法学（15%），还有工学（12%）。

无论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活动怎样混合，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现在相当比例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整体上已经在学生入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过多数优秀的院校依然属于公立高等教育。此外，95%的营利性机构都不是大学，这让人们关心起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质量。这种关注并不仅仅出现在巴西，也不局限于私立高等教育中合法的营利性机构。世界各地多数大规模私立高等教育一般都在质量上低于公立高等教育和私立院校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巴西的大规模毕业生考试（provão）私立的和公立的质量迥异，其中营利性机构的表现比传统认为的要好。

营利性高等教育似乎还有持续扩张的趋势，源于两个发展：（1）更多的非营利性机构转变其法律地位；（2）国内外公开上市交易的大公司与非营利性机构合作开展业务。所有这些趋势都显示出巴西的系统是怎样变得更加多样化的。尽管我们知道营利性机构在这一多样性中愈发突出，就像在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但是，仍然吸引人们去探寻巴西在该地区已经存在哪些匹敌者以及巴西经验是否会在该地区预示营利性高等教育的类似增长。

注：《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定期发表来自“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的文章。该项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参见<http://www.albany.edu/~prophe>。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财政

Ana Garc ía De Fanelli

阿根廷国家和社会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tate and Society) 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
事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资深研究学者

电子邮箱: anafan@cedes.org

拉丁美洲国家在 21 世纪初经济发展强劲,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的首次复苏。此外,伴随“人口红利”,儿童比例降低,上一代已经扩大了工作年龄的人口规模。因此,对于老龄化社会而言,关键是投资提高人力资本,使劳动力人口提高素质和生产力。所以,地区经济增长可能会增加对于培训更多高素质高等教育毕业生的财政资源。

在这些经济和人口背景下,三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比例的变化,以及私人部门在投资分配中的贡献;第二,这一资助模式对平等造成的一些影响;第三,为了分配公共经费所带来的拨款机制的创新。

更多人力资本投入

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的百分比衡量着一个社会 (政府和私人来源) 扩张其高级人力资本的努力。从《2013 教育一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该书覆盖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 获得的数据表明,2010 年的百分比高于 2005 年。这四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这期间大幅增长,以至于投入高等院校的经费总额都相当高。2010 年,四个国家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 (1.6%), 智利还更高一些 (2.4%)。尽管巴西只有 0.9%, 比这些国家低,但数据仅包括公共支出。巴西的高等教育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费。巴西也正在经历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扩张,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总投入远比数字所表现出来的高。

2005~2009 年间,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增长可观。在巴西和智利,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所占比例飙升到 70% 以上,同时,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目前有约一半的学生就读于私立高校。在拉丁美洲国家,一半左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集中在那些以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院校。因此,学生和家长正在为高校财政做出巨大贡献。此外,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向公立院校的学生收取学费;典型例子是智利的公立大学。在其他国家,公立院校的本科学习是免学费的,多数学生集中在公立院校 (例如阿根廷和乌拉圭),政府是首要财政经费来源。然而,这些国家的学生常常要为研究生学习支付学费。

入学机会平等问题的改善

要获得拉丁美洲国家高等教育招生的演变情况,就需要考虑低收入和高收入人口之间的巨大入学落差造成的初始条件。例如,在巴

西, 2000年只有2%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 而来自收入前五分之一家庭的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0%。在这一背景下, 在过去十年中, 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入学增长要比高收入群体快。然而, 由于学生入学在起点上就存在巨大差距, 最穷和最富的学生入学率水平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差距则缩小得更多。

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 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的提高帮助改善了平等问题——来自低收入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入学机会更大了。然而, 尽管拉丁美洲国家在改善低收入学生入学机会上取得了成功, 但这些学生的辍学率也更高。此外, 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常常进入质量较低的高校。未来应该重视改进这些学生的毕业率并增加他们获得更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公共财政拨款的创新

在除智利以外的多数拉丁美洲国家, 协商拨款模式仍然是与分配高等教育核心拨款关系最紧密的机制。此外,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 这些国家的许多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式来分配总预算的很小部分, 将拨款用于达成特定的目标。

在智利, 通过竞争性程序来实现高等教育

现代化的合同被称作“绩效合同”(Contratos de Desempeño)。它们旨在将大学的机构使命与国家和地区的优先事项结合在一起, 将大学自治与公共问责结合在一起, 将院校绩效和公共拨款结合在一起。此外, 阿根廷政府通过一项三年期合同来分配拨款。这样一来, 通过认证的、国家规定的本科生课程可以实现它们对于履行改进计划的承诺。拨款与专业认证结果之间的联系帮助质量保障规程实现了合法化。

这一期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智利需求驱动机制的深化。国家给予的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占国家高等教育投入总额的比例从2005年的29%提高到2010年的64%。智利是少数几个为私立院校提供国家拨款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结论

总的来说, 若干个拉丁美洲国家利用了自己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公共和私人投入。这也帮助改善了低收入学生的入学机会。在分配机制方面, 与前十年相比, 唯一的创新是利用几年期合同改善智利的教育质量、进一步凸显需求驱动机制。未来, 我们应该核实, 拨款的增加除了增进拉丁美洲的科学技术知识发展以外, 是否真正改善了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

哥伦比亚的认证：成就与挑战

Alberto Roa Varelo

哥伦比亚北方大学 (Universidad del Norte) 副校长

电子邮箱: aroa@uninorte.edu.co

20世纪90年代,在入学人数增长,特别是在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出现了质量保障体系。声誉遭受质疑的院校和专业数量庞大。因此,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质量保障体系,当时公共政策的首要任务还是扩大招生,质量已经被忽视许久。1992年,哥伦比亚议会发布了“30号法案”(Law 30),该法案规定了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体制,并建立了国家认证体系。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相比,哥伦比亚的认证并不打算强制开展,也并不意在建立学位授予的最低标准。根据“30号法案”,认证是为了“保障哥伦比亚的教育机构满足最高质量要求,并达成其办学目的和目标”。认证程序被设定为自愿,由国家认证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ccreditation)管理,认证结果是暂时性的。

当时,该国最好的大学将认证视为建立社会问责机制的机会,该问责机制以同行参与评议的外部评价为主。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建立严格评估模式的需求,希望评估可以识别出那些满足最高标准的院校和专业,因为当时大量教育项目的质量都不确定。

学术界开始参与到模式的设计中去,并在后来给予其支持和认可。1995年,国家认证理事会开始运作,并发布了学术项目认证的指导方针。1997年,第一个项目获得认证;2001年,院校认证指导方针被确定下来。然而,虽然认证体系的设计初衷在于强调“高

质量”,但是该体系并没有建立评价最低质量情况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建立了对所有学术项目进行强制认证的标准和程序,这被称为“合格注册”(Registro Calificado)。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rsectional Commiss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成立了,负责评估和授予认证。结果,一个多层次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起来,目前由教育工作观察局(the Labor Observatory for Education)、国家信息系统(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formation)和入学与毕业强制测试对该体系进行了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相比,哥伦比亚的体系,特别是认证体系,已经成为那些开始实施质量保障体系国家(例如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重要借鉴依据。

优势、危机和挑战

在质量保障体系兴起的20年后,有必要认识认证程序对该国高等教育做出的贡献。尤其,这意味着检查认证在该体系中的连贯性和效率。

近来,我访问了八位哥伦比亚高等教育系统的领导和专家:四位名牌大学的校长,两位国家认证理事会的创始人,一位国家认证理事会现任协调员,以及一位外部评估人员、拉丁美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国际专家。调研的目的是探索过去20年间认证是否

达到了其目标。

总得来说，受访的领导对于认证体系的结果表示满意。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院校，他们都认同：一种“自我评估的文化”已经出现，并使规划和决策过程结合得更加紧密，同时这种文化又不失高等教育所重视的自治。他们还指出，除了少数例外，外部同行评估过程对哥伦比亚各个大学的作用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已经帮助巩固了国家的学术共同体，超越了地区界线和院校类型。他们也同意，国家认证理事会的授权一直是透明的、有学术基础的，该体制从结果来看是连贯一致的。他们还认为，即使是那些没有被认证的院校，也认识到模式的正当性，并且渴望达到必需标准。

关于该体系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领导们表示，他们关心政治、官僚主义和官方加快实现政府设定的院校专业认证数量目标所带来的压力这三个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因素会悖逆初衷。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除了公共认可之外，政府并没有为认证院校提供足够的激励。此外，缺乏政策来为那些代价高昂的改进程序募集新的经费。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认证体系是否稳健，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质量核心指标在拉美范围内继续处在较弱的地位。例如，哥伦比亚只有6%的教授有博士学位。同样，除了少数例外，高等院校都没有实施课程现代化的强力改革，也没有加强使用技术来支持大学授课。因此，很少有专业和院校通过认

证，且只有10%的院校达到卓越标准，这就不令人意外了。为了扩大认证，院校有必要理解他们的办学目标并付诸于实践。

结论

目前，有必要继续加强认证体系；同时需要记住，认证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保障“高质量”目的的指引下，认证应该驱动制度改革。在这一点上，政府的多数精力已经放在加强强制认证从而尽职履行其检查和监督的职责。在当前环境下，有必要利用认证程序具有的合法性，推进质量保障体系的衔接。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评估“程序”和“输入”，更重要的是评估学生学习成果等“结果”。

此外，需要更多的刺激。例如，完全的自治应该只适用于那些通过了认证的院校。同时，有必要为院校建立与认证挂钩的竞争性经费；政府为来自底层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发放补贴的财政资助应该对准那些通过认证的项目所招收的学生。

官方数字表明，在过去10年中，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学生入学率大幅增长。现在是该重视质量的时候了，这样才能避免新生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伤害。作为拉丁美洲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哥伦比亚的认证体系在领导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提出质量改进的方案上具有很大机遇。希望未来数年不会丧失这一机遇。

埃及大学中的民主改革

Ahmed El-Obeidy

埃及开罗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iro) 教授

电子邮箱: elobeidy@hotmail.com

当埃及的前总统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被迫在 2011 年 2 月的群众抗议中下台时, 高等教育的反腐败斗争正在愈演愈烈。开罗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iro)、亚历山大大学 (Alexandria University) 等地支持民主的学者们一致推动撤销由政府当局任命大学领导职位的规定。国家总统在获得安全部门批准后, 就直接任命大学校长们。院长和系主任们权力在大学校长之下, 其任命归属于校长的自由裁量权。支持民主的学者们认为, 这样的规定让大学领导人向政府当局效忠。

选举大学领导

为了回应起义, 建立了新的方法来雇用新的大学领导人。在新方法之下, 大学校长由代表们选择产生, 而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则通过教师直接投票产生。开展选举的学院代表通过大学的学院教师选举产生。这与埃及传统上遵循的领导职位任命方法有显著的区别。

根据媒体报道, 大学选举于 2011 年底就在埃及展开了, 参与投票的教师比例超过 90%。选举的结果不仅出人预料, 就连那些期待民主和期待清除从前腐败政权残余的人也很震惊。很多老牌大学的领导人在教师选举之后恢复或保留了职位。选举结果的等级和趋势让革命者们感到困惑。似乎教师们是为了别人承诺会给予的激励和好处而投票, 而不是为了促进学校转型和扩大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投票。似乎教师投票选

择领导, 将大学变成了辛迪加这种企业联合组织, 而不是变成教育和研究组织。

大学领导的典型选举

选举大学领导的做法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选择大学校长、院长的方式截然不同。多数情况下, 选择大学校长和院长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旨在决定对职位而言最合格的候选人。大学的学术领导层职位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学者教师们组成的遴选委员会选择, 推动选择的是一个共识: 学术专业的命运落在这些领导人的决策质量上。搜索委员会的功能是寻找合格的候选人, 并起草一份最恰当候选人的名单。最终的大学校长选自这份名单, 这是治理委员会的责任, 教师建议委员会从旁协助。一旦选定校长, 校长会对治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其它所有领导层职位进行提名和任命。

在这个模式下, 大学的治理委员会或董事会担任大学的顶层治理团队。大学规章制度可以详细规定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以及他们的选择办法。一般, 在美国的公立大学中, 大学治理委员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的州长代表社会选定。为使系统高效运行, 最符合资格的大学领导候选人的遴选过程需要稳定的机构组织和良好的治理。

民主和问责

当被给予实行民主的机会投票来选择大学领导人时, 埃及的大学却无法基于任职资格来选择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如果无法增进

其机构组织和治理的能力，那么埃及大学进行的民主改革就不会成功。打破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需要的不仅仅是选举和投票。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信的教师遴选委员会，对于成功搜索大学领导候选人的过程是重要的第一步。遴选委员会的成员要考虑更广阔的目标，即改进大学系统质量，这个委员会在招聘、面谈、筛选、评估申请人的过程中应扮演主要角色。必须制定遴选领导职位候选人的指导方针，用于指导和协助遴选委员会实施他们物色人选的责任。指导方针可以包括选择候选人的标准，以候选人对高等教育体制的愿景为基础。所有参与到这个过程的人都要接受关于搜索、筛选、选择大学领导职位候选人的培训。

除了遴选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发展之外，其他教师也可以被邀请参与最终候选人的公开访谈环节，这个环节的目的在于给教师机会直接接触候选人，并搜集有关候选人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信息。与候选人开展公开对话可以增进教师参与和程序的透明度。甚至可以将评估表发放给参会人员，让他们在每个公开访问环节结束后提交评估表，这些反馈将会被遴选委员会拿来参考。

决定领导职位候选人的最后决策应该是

大学治理委员会的职责，他们代表社会，扮演信托人的角色。大学治理委员会可以由选举产生的校长、议会或舒拉委员会（Shura Council，即参议院）任命。

结论

埃及支持民主的学者们对改革的需求有望对高等教育产生积极影响。选举已经实施了，教师参与到大学校长、院长和系主任的选择中。但是，选举并不总是选择最合格、最有经验的大学领导的最好方式。

大学的民主改革不应该凌驾于问责制之上。大学领导的选择的确应该提高教师之间的竞争性，对选择程序进行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开展学术改革、改进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从而对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改善大学领导职位候选人的遴选过程。只有通过对所有负责遴选过程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埃及的大学才能确保他们选择的是最符合资格、最有经验的大学领导，这些领导人才能够为学术改革做出积极贡献、充分发挥大学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最终，治理委员会将代表社会做出决策。

越南：新法案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Duy Pham

越南国立大学 (the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duyphn@vnu.edu.vn

越南的“革新”(Doi Moi)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改革)开展20多年来,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院校数量翻了两番,从不足100所增加到2013年的400多所。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现在有220万在校生,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10倍还多。现在,越南有83所私立院校,这一现象是“革新”改革之后从未有过的重要发展趋势。多数私立院校现在以营利性院校模式运行。

一边扩张的同时,由于缺乏国家法律框架来规范高等教育,越南高等教育在行政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许多障碍。这一压力促使越南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于2012年7月颁布了第一个越南高等教育法。该法案包含12章73款。法案覆盖了高等教育的主要议题:高等教育的目标、大学的组织和管理、科学研究、国际合作、质量保障和认证、教职员工、学生等。

新法案的重点

法案的目的是将共产党教育的主要方针和相关政府政策聚集起来,为高等教育创造良好的改进和发展条件。这是高等教育的所有重要问题首次得到通盘考虑并写入文件,交由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审阅,并经国民大会投票通过。

基本上,该法案重申和描述了之前的政府文件中已经陈述过的有关越南高等教育的

关键问题,同时法案中也有首次宣布的新观点。例如,越南国立大学和地区综合性大学的模式在存在了20年后被合法化。在系统整体设计上,法案将越南的体制强行分成三类:以研究为导向的院校,以申请为导向的院校,以及以专业培训为导向的院校。定义每个类别并不容易,对教育与培训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来说,要成功的为院校分类是一项挑战。

为了规范不断发展的私立高等教育,法案首次定义了私立非营利性院校的概念,并与其它营利性院校区分开来。法案还指出,私立非营利性院校将得到扶持,降低其土地租赁费用、获得税收减免、其教师可以获得政府资助。这些都是鼓励人们对非营利性院校进行投资的好政策。然而,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中,几乎没有几个有钱人会重点投资建设一所新的非营利性院校,或者资助一些已有的非营利性院校。

在治理问题方面,一些条款涉及院校自治和质量监控。即使表述上似乎有些模糊,但会根据院校的能力和保障情况酌情给予自治权。在课程发展方面,法律宣布,院校将会有更多自由来设计管理课程。因此,强制性的课程框架将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毕业成绩最低限度的规定。国际经验表明,很难定义和测量学生的学习及其成果,所以,提出相关政策可能会比在400所院校的几百万学生中推行标准

更加容易。

在认证方面，所有的院校都被要求在外部认证组织的协调下经历一个完整的认证过程。第一步是由教育与培训部建立这些组织。未来，独立的认证机构有望担负起重任，并会成为越南院校认证中一个全新的视野。

初步影响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法案生效后几个月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也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潜力。最近教育与培训部通过检查一些院校和专业强调了自己的政府角色。在检查的过程中，教育与培训部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暂时停止了許多专业 2012 / 2013 学年的招生。教育与培训部发现，有 161 个研究生专业缺乏教师，从而无法保障质量。教师被要求补充其他证据以做进一步考虑；现在这些项目中多数都被允许招生了。检查结束之后，大学在保障教育项目质量方面比以前更加谨慎。

教育与培训部为了将法律付诸实践，还协调开展了一些后续活动。教育与培训部主办了工作坊，收集公众对院校分层的意见。

在认证上，教育与培训部近来指定越南国立院校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建造两个认证中心。这两个中心将协调所有院校而不仅仅是国立院校的认证过程。中心并不完全独立，但是这种做法是越南院校认证未来的好征兆，因为这显示出认证中心是运营实体，而不是教育与培训部的机构，有能力承担行政责任。

由于越南高等教育正在快速发展，仅有这项法律本身似乎是不够的。事实上，需要起草法律文件来指导新法律的实施。法律文件应该对院校自治和分层、认证、国际化、非营利院校的扶持政策等进行详细的定义、规范和指导。国际经验表明，要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有效分层，可能需要花很多年、很多资源。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认证体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新法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改善高等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框架。利用这个新法案，越南应该采取行动、建设师资队伍、调动资源，以期支持高等教育发展。

新书推介

Anderson Betty 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Arab Nationalism and Liberal Education*.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254 pp. (pb). ISBN 978-0-292-74766-1.

位于黎巴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创建于1866年,是中东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经历了国家主义的兴起和阿拉伯觉醒。该书讨论了这所大学的历史发展,重点讲述了它一路如何历经风雨。

Barnett, Ronald. *Imagining the University*.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188 pp. (pb). ISBN 978-0-415-67204-7.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Barnett 是英国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是一位长期审视高等教育社会角色的重要思想者,也是对目前企业家主义和市场化相关趋势的批评人士。本书延伸了 Barnett 的思考,核心是提倡想象力——与大学所扮演角色有关的新观点。

Bok, Derek.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79 pp. \$35 (hb). ISBN: 978-0-691-15914-0.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

Derek Bok 是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界最有思想的分析人士之一。他在书中对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反思。讨论范围包括专业教育、研究的角色、本科教育,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尽管内容

聚焦于美国,但 Bok 的洞见具有全球意义。他均衡得宜的分析与当下的很多对高等教育议题的讨论差异显著。

Climent, Vicent, and Francesc Michavila, and Mar á Ripoll, eds. *Los Rankings Universitarios, mitos y realidades* [University Rankings, Myths and Realities]. Madrid, Spain: Universitat Jaume I and Editorial Tecnos. 260 pp. ISBN 978-84-309-5763-7.

本书搜集了2011年7月在西班牙海梅一世大学(the Universitat Jaume I)举办的论坛上所发表的23篇论文,该论坛由海梅一世大学及其创新学习中心赞助。所有论文都用西班牙语撰写,只有一篇是英语。书分四章:“比较大学”、“排名的优点和弱点”、“西班牙的大学和国际排名”,以及“国际评级”。作者们对近年来出现的主要国际排名、欧洲排名以及其它地区性、国家性的排名提出了批评,讨论了西班牙的大学在其中的表现,并指出院校可以改进大学和大学在排名中的位置。

Cohen, Robert, and David J. Snyder, eds. *Rebellion in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1960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337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0850-7.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对美国南方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评论,指出那个年代的学生运动从南方开始,努力为非洲裔美

国人争取公民权利。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和白人一起在学生组织工作。本书特别讨论了南部校园争取言论自由、人种对话、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保守学生运动等。

Cummings, William K., and Martin J. Finkelstein. *Scholars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Academy: New Contexts, New Rules, and New Role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 274 pp. €106.95 (hb). ISBN 978-94-007-2729-8.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是《变革中的学术职业》（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聚焦于美国。“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是一个针对多个国家对于学术职业看法的研究项目。本书主要以美国学者“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为基础，讨论了教师的国际化观点、研究生产力、教学与研究、教师的治理角色等主题。

Dhunpath, Rubby, and Renuka Vithal, eds. *Alternativ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Underprepared Students or Underprepared Institution?* Durban, South Africa: Pearson, 2012. 320 pp. (pb). ISBN 978-1-775784975.

本书主要关注南非的经历，讨论了来自较差背景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大框架。设计远程教育 and 入学机会、入学机会和质量、南非的入学机会问题、科学学科和入学机会等问题。

Geiger, Roger L., and Nathan M. Sorber, eds. *The Land Grant Colleges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3. 356 pp. (pb). ISBN 978-1-4128-5147-3.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

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赠地”大学（the “land grant” universities），即联邦政府通过为各州提供土地来发展高等教育，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关键转型。本书提供了一系列赠地学院从19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分析。本书是每年都出的《高等教育史论》系列丛书（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series*）的第30本。

Goodman, Roger, Takehiko Kariya, and John Taylor,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Changing Relationship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13. 269 pp. (pb). ISBN-873927-76-2.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

在大众化和私有化时代，很多国家的政府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本书分析了西欧、日本、韩国的这些变化。讨论了英国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韩国和英国的政府、市场和高等教育，日本大学和政府关系的转型，日本政府和私立高等教育等。

Kelly, Andrew P., and Kevin Carey, eds. *Stretch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Dollar: How Innovation Can Improve Access, Equity, and Affordabi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3. 260 pp. \$29.95 (pb). ISBN 978-1-61250-594-7.

Web 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本书各章都是有关美国高等教育使用技术、降低成本的创新观点，讨论了高等教育的基本成本结构、学生服务、在线创新等议题。作者们似乎认同，传统的大学太昂贵，

需要提高效率。

Lang, James M. *Cheating Lessons: Learning from Academic Dishones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5 pp. \$26.95. (hb). ISBN 978-0-674-72463-1.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数据显示, 约四分之三的美国学生在本科阶段作弊。本书引用美国的数据和例子, 讨论了作弊的研究文献, 并为减少作弊提供了有用的建议。作者强调了将课程学习作为主要策略的重要性。

Leibowitz, Brenda, ed.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Voices from the South*.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 2013. 224 pp. (pb). ISBN 978-1-85856-521-7.

Web site: www.ioe.ac.iuk/ioepress.

本书的焦点是大学作为公益事业的角色。虽然各章作者来自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 但观点主要来自南非。书中讨论的话题包括健康科学的学生社团、工程课程的全球化特点、培养大学中的公益事业等。

Mukerji, Siran, and Purnendu Tripathi,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3. 2 volumes. \$450.

ISSN 978-1-4666-4458-8.

这两册书的各个章节之间彼此无关, 包括国际学生交换、国际学生观点和其它不一定相关的问题, 并不特别专注跨国高等教育。涉及的议题包括跨代学习、通过能力本位教育来课程发展、评估大学服务的跨文化方法、全球化研究的课程、双学位专业管理等。

Nielsen, Larry A. *Provost: Experience, Reflections, and Advice from a Former "Number Two" on Campus*.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ers, 2013. 372 pp. \$35 (hb). ISBN 978-1-57922-969-6.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本书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中教务长角色的非正式反思, 讨论了教务长(常常负责大学“内部事务”的人)怎样在教师、学生、校友、理事会等盘根错节的校园里工作。

Schoole, Chika, and Jane Knight,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Achieving the MDG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3. 183 pp. \$54 (pb). ISBN 978-94-6029-309-6.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搜集的文章围绕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材展开, 讨论了国际合作的发展和影响、学术流动和性别角色、国际化对达成千年发展目标的作用等。

